

◀ （上接 9 版）

宫崎市定博士是一位基于良心和自信之上充满视野和气魄的历史学家。初入学林便涉猎广博。“起家”之学为宋史研究。与宋代相关的杂笔、援引，多如散沙，然未经博士之眼者鲜。绝不为引用而引用，所有史料都在为构筑立体的框架而作用。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业绩《九品官人法研究》，通过对数百人物补任的探讨，解开了贵族政治的秘密。人性中恶的一面，有时会留下阴影，因此，历史学家的良心，就是不停留在文献的表面。涉猎广博，就是不踟躇于东洋史的专业范畴。正因为如此，博士独具慧眼，指出欧洲、中国、波斯·伊斯兰这三个世界分别存在着共通的文艺复兴现象。高论激起的波浪，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博士自言：“能够判断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后来者。”我倒是觉得，博士真正的志向，不仅在于同行后学，也不仅在于像我这样专业相近的非历史学家，而在于向所有的人叙述历史，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国推理小说那样，流畅达。

吉川为写这段推介词，熟读了宫崎《亚洲史研究》四卷本的全文，用短短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介绍了本书的内容和成就。今天我们同样可以用吉川幸次郎的推介语，来评价作为《亚洲史研究》续集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三

正像宫崎本人在《亚洲史研究》第一卷及吉川幸次郎推介词中所见到的那样，宫崎市定的“主业”虽然是以中国历史为中心的“东洋史学”，但其视野确是亚洲史甚至是世界史的。

“流经日本桥下的水，与泰晤士河相通；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柏林墙的问题，与朝鲜的三八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学术研究中，要想理解世界历史，那么，最终的关键似乎正藏匿在东洋史中。如果想真正探究西洋史的意义，那么，对东洋的理解则必不可少。”这是宫崎 1950 年为自己的著作《东洋的近世》所撰“前言”的开篇。生活在冷战时期的学者，意识到“柏林墙”与“三八线”的关联似乎并不难，然而，土生土长的“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中，怎么可能会

有金发碧眼的“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但，这就是宫崎的史学视野。“江户汉子”与“巴黎姑娘”只是一个隐喻，但就像“柏林墙”与“三八线”所明示的那样，纵贯东西，即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用世界史的眼光来理解东洋史，同时通过对东洋史的理解来探究西洋史的意义，是宫崎史学中最具特色的一点。

1922 年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的宫崎市定，不仅继承了内藤湖南扎实的中国史学功底及中国史分期学说，更受到了桑原鹭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东洋史学及世界史学这一广阔视野的熏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史、中亚西亚史、日本史及欧洲史。宫崎广阔的史学视野表现在其几乎所有的著作之中，而基于东西交通史的立场来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及所谓“东西交通视野”的运用和实践，主要集中在收入《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的各篇(种)中。

宫崎的研究领域虽属东洋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但其在研究中时时观照其他文明、展开对比研究的手法非常令人瞩目。如其在 1965 年初版的《东洋的古代》一文的《前言》中说：

我研究的出发点，是力图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中国古代的文化、社会与欧洲、西亚的文化、社会进行比较研究；还有，正如希腊文化、拉丁文化为欧洲人所共有一样，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组织，并不只为中国所独有，而见于整个东亚世界。因此，本研究虽然实际内容是中国，但与此前研究近世和中世时一样，我还是使用了“东洋”一词。

又如，在初版于 1940 年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中谈到中国历史上首个大帝国秦王朝时说：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巨大帝国。周王朝最强盛的时期，虽然能够号令中原，但其能控制的区域亦仅限于今河南省及其周围地区，不过是秦王朝的数分之一，而秦朝却已经控制了今中国本土十八省的大部分区域。与西方古代历史的比较也颇有趣味。波斯大流士大王统一古代东方诸国是公元前 518 年，比秦始皇约早 300 年；亚历山大大帝率兵东征，灭亡波斯帝国是公元前 330 年，比秦始皇早约 100 年；迫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压力，应运而生的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南征北战，将帝国的版图推向了空

前，这一年是公元前 261 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早约 40 年。……其实，在统一以后帝国的统治方策上，秦王朝所采用的手段也与西方如出一辙，东西方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让皇帝的威严光被万民，他多次巡幸，每到一处，都要刻石记功，训导百姓，以垂后世。并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向四方建设驰道，这些重要的军事通道确保了中央与地方的密切联系。同时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文字及货币。自波斯大流士大王以来，凡是强权君主，在征服各国以后，都会采用几乎同样的手段，确保统一国家的正常运作。不过，向来归功于秦始皇的郡县制度，虽然貌似波斯帝国设省置总督的州长制（指古波斯帝国的 satrap——笔者注），却并非始于秦始皇，早在战国时期各国内部就已经实行，秦始皇只是消除了七国的国界，在帝国疆域内统一推行而已，结果天下便分为了三十六郡。

从上引两个段落中频繁出现的中国、东洋、欧洲、西亚、波斯帝国、孔雀王朝、希腊文化、拉丁文化、大流士、亚历山大、阿育王、总督州长制、郡县制等名词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了宫崎史学的视野，即世界史的高度。

在宫崎看来，人类的文化因交通而发达。在《东洋的近世》篇首《世界与东洋的交通》中开宗明义：“居住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以及南非、澳洲的土著居民，他们的文化都不繁荣。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的自然资源贫乏，而在于他们远离世界交通的大动脉，被人类的进步所遗忘。人类的文化，说到底是人类全体合作的产物。某个地方的发明，因为交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受到刺激的其他地方，往往又能作出更新的发明。人类文化的发展，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波折，但总体上是不停向前发展的，这只要看一下纸、火药、罗盘等发明的传播路线便可一目了然。然而，与世界交通疏远的地区，其居民无法均沾人类文化所带来的利益，反而因为文化差距的日益加大，他们在意识上更加抗拒外来文化，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自身社会的封闭性，与外界的交流变得越发困难。”因此，宫崎认为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与交通的流量成正比，文化的发达不用说是需要舞台的，条条大路通长安，这就是贯穿东洋古代和中世纪的一般现象。

具体到今天重新热议的

海陆丝绸之路问题，宫崎在上引《世界与东洋的交通》中，对其意义即作出了深刻的理解，我们举两例来说明。

第一，关于陆上丝绸之路。宫崎作如下说：从秦汉统一到唐代，中国的都城主要设在长安，间或设在洛阳。长安位于今陕西省的渭水盆地，自古以来，盆地周围的分水岭上就设有四个关口，防御外敌的入侵。所谓的“关中”之地，所恃的是天然的山河之险。此外，还可以找出交通上的理由。当时，世界性的交通干线，通过今新疆天山南路的孔道，贯穿着东亚和西亚，长安则是控扼从西方延伸而来的交通路线进入中国东部大平原的关口。也就是说，长安是对西方贸易的陆港，中国的特色商品首先积聚在这里，然后卖到西方商人的手中，同时，外国进来的商品也在这里卸货，然后转卖到全国各地。



1935 年的宫崎市定

不仅如此，宫崎还关注到陆上丝绸之路的东延。“这条横断亚洲大陆的交通路线，从长安伸向更远的东方，经过洛阳，沿黄河出渤海湾，沿中国东北和朝鲜海岸，到达日本的九州北岸。日本民族一开始就充分利用这条交通路线，与大陆之间展开了贸易。”宫崎在几乎 70 年前，就认识到了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起点于长安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线，而是贯穿亚欧大陆东西向的交通大动脉。

第二，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及南北大运河。宫崎主要是通过探讨隋唐大运河的世界史意义作为切入点展开的。宫崎说：连接东亚和西亚的交通路线，除上述贯穿北方的陆路外，还有南方的海上航路。中国沿海的航路，按理可以通往任何地方，但实际上由于长江口以北的沿海缺乏良港，因此长期以来未见有所发展。长江以南的浙江、福建沿海，海岸

线比较曲折，可以找到抵挡风波的港湾，并且时有运送大军的记载，从古代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了利用。但大规模的海上交通，则是以广东为起点的南海航路。从广东出发，趁着冬季贸易风的航船，途中在占城沿岸停靠，取得燃料、饮水和粮食的补给，再一路南下，自然可以到达马来半岛的南端新加坡一带。从新加坡开始，航路分为两条，转往东南，则经爪哇可以到达香料诸岛。很多中国商船以爪哇为终点，满足于从爪哇人那儿购得商品。从新加坡转而往西，出印度洋，横渡孟加拉湾，可以到达锡兰岛。中国商船大多在此与印度、波斯及阿拉伯商人交易大宗货物，然后折回，继续往前到达波斯湾口的商船非常罕见。流入波斯湾的有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溯两河而上，就能与北方的陆路大干线交会。幼发拉底

河的西岸就是叙利亚，这里面临地中海，从海岸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出航欧洲。

这样，贯穿亚洲东西的南北海陆两大交通路线，其西端在西亚的叙利亚附近会合，但东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这是由中国的地形决定的。尽管中国拥有广阔的平原，但其主要的河流均为东西流向，这有利于东西之间的交通，但南北的交通却受到阻碍。但隋炀帝对南北运河的大规模整治，使之成为沟通南北的系统性水路网络，北自白河，贯通了黄河、淮河、长江，直达南方的钱塘江口。

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来看，宫崎认为，隋炀帝留下的遗产大运河对后世的恩惠，当然就不应该只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它，它在促进中国内部交通的同时，还将横断亚洲